

翰林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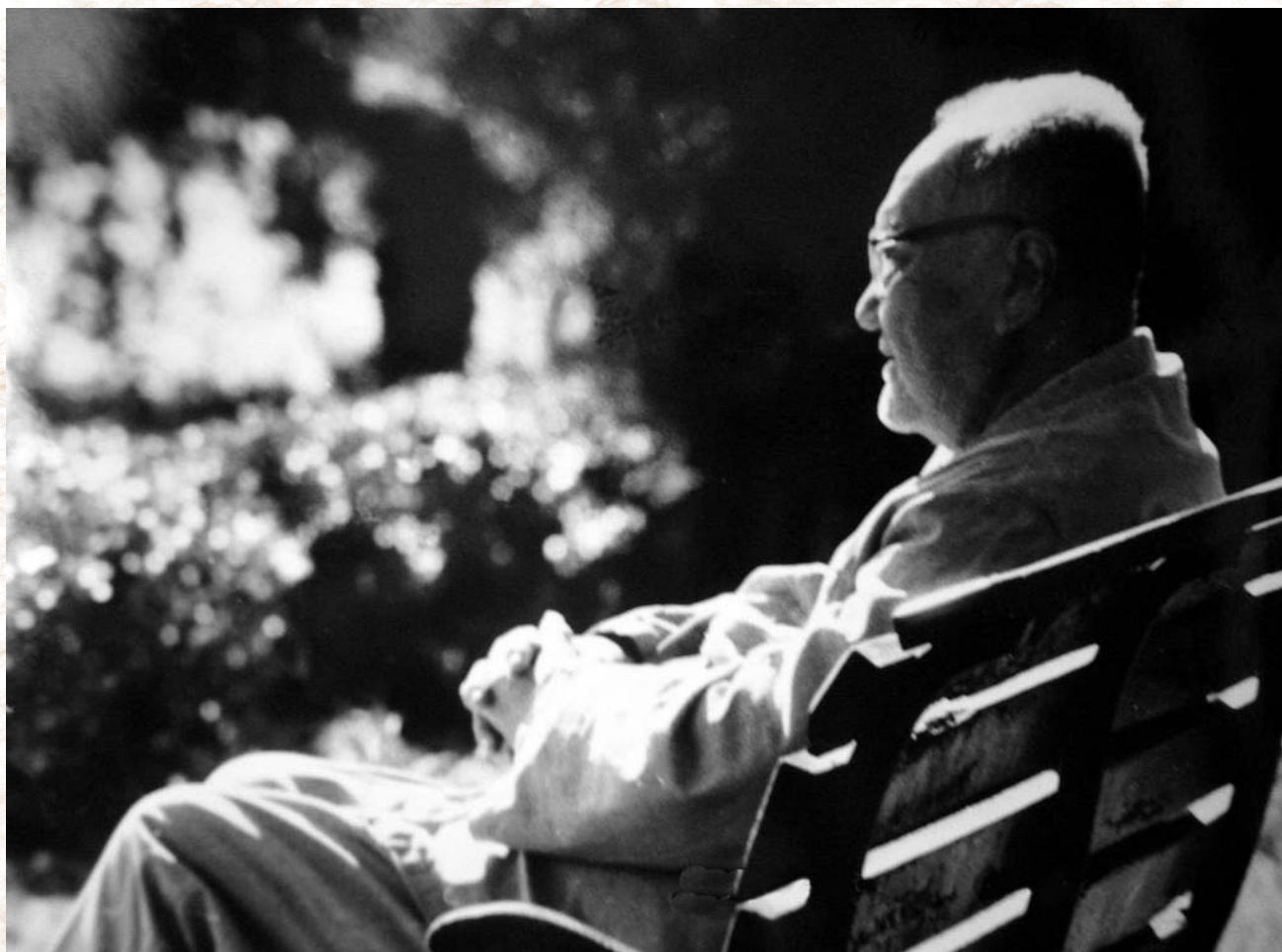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典范蒋硕民教授

蒋迅

欧阳顺湘博士在《数学文化》第3卷第3期里有一篇非常精采的文章“最美的数学就如文学”，其中提到一位受哥廷根的两位中国学生——魏时珍和朱公谨影响而赴哥廷根随柯朗做博士论文的人，他就是原北京师大著名教授蒋硕民（1913年3月11日 - 1992年5月11日）。2013年3月11日是蒋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说起蒋硕民教授，可能现在的年轻数学家们大多不知道他。根据互动百科，“蒋硕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是偏微分方程、近世代数。蒋硕民是中国偏微分方程学科的先行者，近世代数早期介绍者之一。他集中西学问于一身，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把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教育事业。”（材料取自程民德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数学家传》第三卷）这样的论述比较精

辟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蒋硕民先生1913年3月11日生于北京一个民主革命派的家族。父亲蒋作宾，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参加辛亥革命。母亲张宏楚，是辛亥革命志士张通典之女。蒋硕民先生1928年进入世界有名的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在德国，他受教于希尔伯特（D. Hilbert）、柯朗、埃米·诺特、赫格洛兹、冯·诺依曼、雷立奇、范·德·瓦尔登教授等大数学家。蒋硕民先生的博士导师原为柯朗。他得到柯朗所拟定的题目后，经过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证出该题是错误的，才又换为偏微分方程中层次相当高的“双元 N 次偏微分方程的一个混合边值问题”。在二战期间，柯朗因是犹太人被一些走了极端的学生赶出德国。他不得不转从雷立奇教授。



蒋硕民先生在北师大校园休息（李小烈摄影，陈黎提供）

1934 年秋，雷立奇被聘为马堡大学数学系教授，蒋硕民先生随其前往，一方面撰写论文，一方面帮助雷立奇做些工作，写讲义，还上讲台解释。1935 年 6 月 19 日他获得马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回国后，蒋硕民任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年仅 22 岁。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开大学被迫迁往长沙，不久迁往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蒋先生随学校辗转到了昆明。1940-1941 年，日本侵略军大轰炸西南联大，一年级被迫搬到四川叙永去设立分校。蒋硕民、程毓淮和刘晋年三位教授前往并同住一单身教授房间。1941-1945 年，他转往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数学系。1945-1946 年，他回到西南联大。这一段时间里，他先后教了很多课程：微积分、高等代数、近世代数、微分方程论、偏微分方程论及变分法。抗战胜利后，联大的三所学校复原，



蒋硕民先生和蒋夫人杨维仪的合影

蒋先生因为原来是南开聘请的，有约在身，故前往天津南开任职。1947年蒋硕民先生由南开大学休假去纽约柯朗研究所进修。1948年再次回国，当时西南联大给云南留下了一个昆明师院，由杨武之教授任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力邀蒋先生留下任代系主任，于是蒋先生向南开大学请了一年假到昆明师院，后来新中国政府成立，冻结人才，他没能再回到南开。1954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时候，蒋硕民先生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二级教授，直到退休。当时教育部的人似乎不知道有这样一位资历颇为丰富的数学家。蒋先生身为昆明师院的教务长到教育部开会，很多大数学家都与蒋先生寒暄，而且中山大学和南开大学都邀请他去，这才意识到这个人很了得。当时那两所大学都归高教部管，而教育部不愿意把他让给高教部管辖的学校。于是一个调令让他10天内从昆明到北京，任北师大二级教授。后来他的女儿回忆到，一家人从昆明到北京，光汽车就坐了七八天。在北京师大，他先后主办了分析数学方向的青年教师讨论班、进修班、研究生班及助教班等，担负起了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工作。此外，他还为研究生班、助教班系统讲授实变函数论、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等课程。1992年5月11日，他在北京去世。

蒋硕民先生身体一直不好，文革期间又被迫做他不能承受的体力劳动，到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进校读书的时候，蒋先生已经因身体原因不能站在讲台上上课了。记得那时我们同学一起到图书馆前散步，时常看到蒋先生坐在椅子上晒太阳。我们也就利用这个会面上去与他聊天。77级有一些同学因为在文革期间自觉学习了英语，学校允许他们免修英语。于是数学系领导找到蒋先生，希望他能为这些同学开一个数学英语学习小组，他愉快地接受了。课堂就设在他的家里。这是他最后一次为学生上课，而且不是一门正式的数学课，但他仍然认真准备。上课时，同学们都聚集到他的家里。虽然他是留学德国的，但他的英语、法语也同样精通，甚至能阅读英、法文的文学名著。1950年，他旁听俄语课，一年后就阅读俄文文献。

到大学毕业时，其中一位同学在申请留学时请蒋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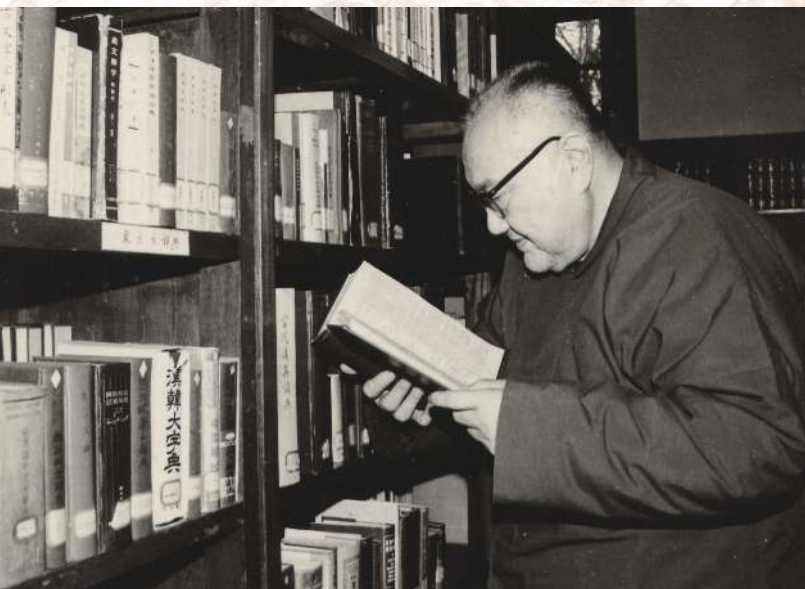


蒋先生和北师大数学系分析教研室的老师们



蒋先生和洪良辰、周美柯、李艾青、卞中丹、洪吉昌老师（从左到右）

写推荐信。蒋先生让他先用英文写了一个自我介绍。这位同学的英语虽然还不错，但写出来的东西还是跟西方人的写法有很大差距，比如中式倒装句，用词不当，从句过长等等。没有想到蒋先生亲笔为他把这篇短文重写了一遍，而且一段一段地告诉他为什么这么修改。1986年，这位获得密西根州立大学助学金并将要赴美留学的学生去向他告别。蒋先生高兴地介绍了这个学校，就好像他在那里生活过一样。后来，蒋先生把他手写的推荐信交给了这位同学，我也得到了一份



蒋先生在系资料室参阅文献



蒋先生在参加会议

复印件。它印证了高枚老师在他的文章“高山仰止——忆蒋硕民师”中对蒋先生“清丽的小字”的描述。

蒋先生在现在的数学界的知名度不高，但是老一辈数学家都知道他。1985年7月4日，当代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到北京师大作“微分几何50年（1935-1985）”的学术报告。在我的印象中这是陈先生唯一一次到北京师大演讲，据说是因为蒋先生的邀请。在会上，他一开始就专门提到了蒋先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蒋先生在哥廷根的同学程毓

淮博士也曾应蒋先生的邀请到北京师大做过学术报告。我手中还有一份田方增先生手写的回忆蒋先生的资料，不知道是否发表过。徐利治先生在一次访谈中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西南联大数学系，除了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騄这“数学三杰”十分突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比较突出的数学人才？”徐先生说：“应该提到的是两位从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回来的教授，一个是程毓淮，另一个是蒋硕民。……蒋先生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程先生后来去了美国，十五年前回国时，我在长春还接待过他。听说，他现在也去世了。这两个人学问很好，但不大写文章。因为他们不怎么写文章，也就没有什么名气，报纸也不会宣传。他们在哥廷根大学听过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 1862-1943）和柯朗（Richard Courant, 1888-1972）的课。哥廷根大学当时是世界数学的一个中心。”

蒋先生与夫人杨维仪先生是在法国（不是在西南联大）认识的。杨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抗日战争开始后回国。1955年到北京大学西语系工作，先后任法语讲师、副教授、教授。杨先生有时候显得对蒋先生厉害了点。蒋先生有糖尿病但又喜欢吃糖。记得有一次蒋先生刚刚拿起了一块糖，一下子被杨先生抢了过去。但谁都知道这是杨先生对他的细心关照。她一直是蒋先生的贤内助。我在美国留学期间需要学习法语。那时候互联网远没有现在发达，杨先生立即把她为北大编写的法语课本送给了我，还为我专门录制了两盒磁带，把其中全部课文都朗读了一遍。1994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原来她要到华盛顿特区去旅游，希望见我一面。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几天之后，杨先生在返回中国的国际航班上突发脑溢血，在东京病逝。

我在高枚老师的文章中读到“蒋师一直保持着自己在哥大求学时的作业，其中就有一些是经外尔（H. Weyl）批改并且在卷后签名的”。高枚老师在回忆录里写了很多关于蒋先生书籍的片段。在文革期间，蒋先生一家“只留得一大一小两间。没有地方安放书橱，又不忍将藏书作废纸处理。于是，依著一面墙，将书一层一层摆起来直至屋顶，形成了一堵书墙”。“先生拣出几本书让我带回阅读，其中有纽约大学数学研究所新近寄赠的英文版《希尔伯特传》。此书后来有了中译本，可惜没有收入原书卷首许多珍贵照片。”在他去世以后，杨先生把这些书籍和笔记都捐献给了北京师大数学系。联想到高枚老师的记述，我猜想那里面很可能有大数学家留下来的笔记呢。记得当时北师大数学系把这些书都存放在资料室。如果这些书籍还在的话，也许里面会有很多珍贵的文物。但愿数学系（现改名为数学学院）被搬出数学楼时，这些



书也跟随到了新家。

前面说过，蒋先生的身体不好，晚年多次住院。记得有一次我到北医三院去看望他，在病房里看到的是一瓶鲜花。这是我第一次在病房里看到鲜花。那个时候人们到医院看望病人一般都是带去水果罐头，第一次看到鲜花让我眼前一亮，原来还有这样的好礼物。他的家人轮班到医院陪伴他，到实在排不开的时候，我也加入进去。记得有一次他在病床上要小便，但不愿意麻烦我，竟然一直憋着。我当时没有经验也没有发现。后来一直后悔自己粗心大意。最后蒋先生过世也是在医院里，他那次一开始只是感冒，但因为年龄大了，又有多种疾病，所以还是住进了医院。医院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没有重视，将他跟好几位病人排在同一个病房里。结果，他的病不但没好，反而加重，最后竟与世长辞。

令人欣慰的是，蒋硕民先生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我们可以列出的曾经受教于他的就有：李政道、林家翘、樊畿、程民德、万哲先、田方增、黄祖洽、王宪忠、叶彦谦、越民义、秦元勋、杨忠道、严志达、曹锡华、段学复、钟开莱、江泽坚、江泽培、谢邦杰、栗汝书、崔士英、郭本铁、杨忠道、陈国材、聂灵沼、王寿仁、孙本旺等等。很多人到北京时都会去看他。他育有四个子女。除了大儿子溺水

身亡外，其他三位都成了数学工作者。他淡薄名利，真的是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了一切。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北师大的后来人，什么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北京师大校训）。

正值蒋硕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笔者特地写了以上一点回忆，以纪念这位数学家。

附：“高山仰止——忆蒋硕民师”

高枚

1992年5月15日，天色阴沉，清晨就下起绵绵细雨，独坐对书，倍感凄冷。近午时分，却收到北京师范大学讣告：蒋硕民教授已于11日凌晨去世，15日向遗体告别。我无法赶到瞻仰遗容，只能去邮电局拍发唁电，仅表哀思。当业务员核数计价时，我呆立一旁，突然悲从中来，涕泪俱下，几不能持。此后数日，往事如潮，涌上心头。绛帐依依36年，有许多事情应该写出来留个纪念。今年适逢先生五周年忌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1957年暑期数学分析教研室三届毕业纪念师生合影 1957.7.9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一九五九年全体毕业生合影

日，乃作此文，以献一烛心香。

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30余年，受益最大的大概是1956-1958这一期数学分析研究班的学生了。头一个学期，先生给我们讲的主课是“实变函数论”，同时又开了一门“线性代数”。上课时他解释说：“你们读分析专业，也要兼学代数。这样，将来教学和研究的思路都能宽一些。”当年先生虽然春秋鼎盛，但因患有高血压症，不能过累。然而两年期间，接连给我们讲了五门课。先生讲课，侧重数学思想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学科的发展方向，但也不忽略细节。板书整齐，随讲随写，清丽的小字很快就布满一块黑板。教室的玻璃黑板是两小块对接在一起，先生每个课时都是写满两块以后，擦掉；再写满，就响起下课铃声。先生还要求我们认真做作业。他曾对我说，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专业在希尔伯特的年代，学生的作业都要全部批改。后来被誉为本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的外尔年轻时曾协助希尔伯特做辅导工作，蒋师一直保持着自己在哥大求学时的作业，其中就有一些是经外尔批改并且在卷后签名的。

两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同学们分赴全国各地。我因为在北京有家，寒暑假回来总是要到先生府上问候，师生关系愈发亲切，我也因此受到更多的教诲。十年浩劫，先生难免受苦。前期风暴过后，遣往锅炉房劳动。住房逼仄，只留得一大一小两间。没有地方安放书橱，又不忍将藏书作废纸处理。于是，依着一面墙，将书一层一层摞起来直至屋顶，形成了一堵书墙。我看到了曾经惦记：这样放书固然省地方，取阅却极不便。上层的够不着，底层的承受上面的压力也拿不出来。不过在那年月还有谁顾得上读数学书、外国书呢？随即释然。1973年以后，先生的处境有了改善。据说政府考虑到蒋师在国外的亲友要回来探视，住房恢复到原来的比较宽敞

从上至下：

1957年暑假数学分析教研组送别赵得春及韩汝瑜赴青海工作留影。前排左一为蒋硕民

1958届进研班合影。前排左四为蒋硕民

1959届毕业生合影。前排左六为蒋硕民

的格局。我前往祝贺，先生正坐在小沙发上，右手茶几上堆着高高的一摞书刊，左边一只方凳上散放的大概是已经看过的，先生手持一卷坐在这两堆书之间。告辞时，先生拣出几本书让我带回阅读，其中有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新近寄赠的英文版《希尔伯特传》。此书后来有了中译本，可惜没有收入原书卷首许多珍贵照片。半年后我将书送还给先生时，谈到有关大数学家兰道（E. Landau，犹太人）被学生中的纳粹分子驱除出哥廷根大学的记述。先生说确有其事：“当天我在校内数学研究所查阅资料，有几位路过现场的同学告诉了我大致的情况”。言罢恍然，默坐良久。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我终于能够真正以数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了。此时离研究班结业已19年，先生却更加细致地指导我的学习和工作。有一次议论选定教科书须顾及学生的程度，先生告诉我4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执教时，曾经以梯其玛希（E. C. Titchmarsh）的名著《The Theory of Functions》（《函数论》，1962年国内出版了中文译本）作为课本；这本书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深了一点，学生感到困难。说完先生谦和地笑着又加了一句：“那时我还是年轻啊！”

1985年秋，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庆祝先生执教50周年。那天有几位数学界前辈，如江泽涵先生、段复先生也莅临会场，表达他们与先生的情谊。可惜先生正住院就医，未能与老友把袂共披心腹。从那以后，我也很少有机会再坐到先生身边，倾听先生亲切的谈话了。叩访时往往是小保姆应门，告诉我蒋先生去医院看病了。1989年春节，正月初三，我去拜年。在门口望见先生靠在藤椅上，有两位客人在座，夫人杨先生陪坐于侧。先生看到我，即稍稍欠身，叫我：“高……”。客人辞去以后，师母感慨地对我说：“他还能记住你们这几



1961届研究班合影。前排左四为蒋硕民



1969届3班合影。二排左五为蒋硕民。1968年7月由首都工人、解放军组成的“工宣队”进入北师大。这是“文革”期间老先生第一次出现在合影中。

十年前的学生的姓名，可是我们孙子的名字，告诉他许多次，他总是记不住。”是的，我知道先生的心中除了数学以外，只有自己的学生。

先生出身名门，早年负笈欧洲，受业于数学大师希尔伯特、柯朗，交游皆一时俊彦。学成归国，执教西南联大等著名学府，弟子当中，颇多中国数学界菁英。大陆解放，安居国内，按照各个时期的客观条件，尽心尽力，为国家培养人才。门生遍天下，薪火有传人。大去之日，先生亦无愧矣。